

鄧演達先生行述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重印

鄒達先生行述

一，鄧演達先生傳略

二，鄧演達先生的生活

革命運動的發展，是中國人民的命運。鄧演達先生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損失。鄧演達先生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損失。鄧演達先生的死，是中國革命的一大損失。

二 鄧演達先生傳略

繼承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眾的立場，革命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反動的統治者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在這外侮日亟，軍閥橫行，民生憔悴的今日，竟失去中國革命的唯一導師，瞻念前途，曷勝悲痛！先生盡瘁於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羣衆與反動的統治者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它挽救沒落的途徑中，竟用卑鄙的手段，戕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的象徵！在先生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為民族解放而犧牲，是算盡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蹟，却是革命後死者的典式，他的革命任務，却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為著永留後蹟規範；為印證中國革命的途徑，特述先生事略如下：

二 革命的童年

先生諱演達，字擇生，廣東省惠陽縣人，其所居，係惠陽縣之鹿頸鄉。從小便生活在農民區域中，該處社會組織殊為特異，與其他農村區域不同，就是地主與佃戶，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

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層見疊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遊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胼手胝足，鳩形錦面，苦樂的懸殊特甚。先生適生是鄉，童時對于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思想及土地革命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值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目染，遂又種下先生民族解放思想與反抗帝國主義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於是在八歲時，即參加革命的實際活動。先生以年幼，常隨姚雨平輩作交通員，往來於廣州佛山間，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經手傳達，機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黨員皆亟加稱許。因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稍長即志在做一個有用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學的動機。

一 革命的準備時代

先生十二歲時，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爲同學中最年幼者。但先生聰穎奮發，輒爲師友輩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器重，至目爲奇才。辛亥之後，先生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軍中，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先生復回粵重修軍事學，畢業於廣東陸軍速成學校。但當時中國政治社會混亂的軍事統治之下，黑暗萬分，革命勢力逐漸失敗，先生感覺異常煩悶，卒於民國三年建

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從事於經濟科學的研究。中間，袁氏稱帝，繼以北洋軍閥的專橫跋扈，中國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落，先生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以從事工業，但限于家庭經濟，終未果。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學於保定軍官學校，於研究軍事學之餘暇輒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邊防軍入伍見習，充下級將校，旋由鄧仲元生名回漳州，使統率憲兵，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努力革命事業了。

三 初期的努力

孫中山先生令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驅逐舊桂系，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及廣東恢復，鄧仲元先生成立粵軍第一師，先生即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先生即知陳炯明之跋扈，是終不能爲革命努力的，只有努力培植第一師的基礎，使成爲革命的武力，並以牽制陳軍，使不敢有異動。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心，仲元先生亦深知先生之才，二人互相倚重，以發展第一師所負之革命事業。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終成爲各團營之模範，於是粵軍第一師的基礎，也就很穩固了。當時陳炯明已漸不能服從孫先生的指揮，對於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發展，每多方掣肘，而且漸漸暴露其軍閥割據的主張，隱然以廣東爲已有。粵軍第一師，隨着鄧仲元先生與先生之措置，每左右其間，使陳炯明之陰謀屢欲發而屢止，粵軍第一師因對於革命多方維護，遂遭陳炯明之忌，陳知學的第一師必阻撓，逆謀，但當時陳受環境的影響和私慾的支配，逆謀已有不能復已之

對，故首謀消滅粵軍第一師；而方仲元先生終于被刺，仲元先生被暗殺以後，先生悲痛着知己的慘死，報仇心急，且深知革命勢力一希望在維持第一師，圖假其全力鎮壓軍心的動搖，陳炯明終莫可如何。

四、革命的護持者

孫中山先生知陳炯明終懷異志，且知先生對於擁護革命，夙具決心。於是特將先生所統率的獨立營改編爲警衛軍，以警衛總統府。民國十年北伐軍已入廣西，陳炯明益攬權跋扈，扣抑餉械，使北伐軍不能發展，及孫先生由桂回師，陳炯明退虔東江，第一師因先生之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全部出動，民國十一年北伐之役才能實現。北伐軍向北推進，第一師前鋒已過贛州，而陳炯明嗾使葉舉等圍攻總統府的事變忽起。這種消息傳到前方，因不明真相，各部隊均發生動搖，第一師亦毫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部第四團，由信豐退據河源。先生自己則潛赴香港轉上海，見孫先生商量善後辦法。後陳銘樞辭去軍職，學佛於南京，先生則連合陳濟棠、張發奎等形成新團結，整理軍隊，相機以圖再舉。十一年冬，孫先生檄調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東下驅逐陳炯明，第一師首先響應，滇桂軍遂兵不血刃而佔廣州，然第一師亦從此分化矣，先生毫不顧惜，與諸將領商議結果，將軍隊重新編配，推李濟深爲師長，先生而任第三團團長，於軍中多所建樹，使第一師及其所孕育之第四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不少的功績。論者每以先生努力爲多！陳炯明的殘部既被逐出廣州，仍盤據東江一帶，而如震寰、楊希閔等羽毛已豐，則又復飛揚跋扈。

感，把財政，刦奪稅收，無所不爲，革命局而復陷於困頓境地。孫先生因處廣州，一籌莫展，因爲斷兵悍將，早已不復知有孫大元帥，更不復知有所謂革命了。先生於此時並不畏難，益期奮鬥爭，最先想法使第一師討滅沈鴻英殘部，桂軍復初等，由江門四邑漸移入西江一帶，然後極力啓導廣西新興將領黃紹雄白崇禧等以革命大義，與取得相當的聯絡，於是自肇慶以至梧州連成一氣，聲勢益壯，楊希閔劉鎮寰石生等於這種威脅下，乃稍歛抑，而孫先生也就可以從容佈置了。在這時期先生作事，每獨任其勞而使他人受其名，艱苦卓絕，任勞任怨，但先生之精神與魄力，不特爲同儕所信服，亦且爲反對的敵人所欽敬了。

五 黃埔軍官學校的建設

孫先生當時外受陳炯明的攻擊，內受楊希閔等的挾持，感覺到非訓練革命的武力，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並以消除黨內的反側，乃與先生等商辦黃埔黨立陸軍軍官學校，並欲使先生任訓練部主任，先生力辭，卒推李濟深居正而自爲其副。黃埔軍校開辦之後，所有人才的招致，訓練的規劃，都由先生主持其間，悉心經營，不遺餘力。軍校開始時，學生不過四百多人，在其所屬的社會成份上說，十之八九是小有產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霸佔廣州的時代——與全國的凝固於腐朽的政治局勢中，頗足以激動大多數青年的憤懣與努力。先生在這時候盡力於國民黨革命任務的宣傳與訓練，構成當時黃埔學生的靈魂——因爲開辟了鐵船鋪就，所以在後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楊劉作戰所向無敵，發揮時代的機能，就是繼

種原故——這時候學生對於先生的愛戴，和先生對學生的嚴肅與慈愛，構成當時的革命中心團結形式。學校當局深忌先生，轉倚王伯齡為心腹，王又援引其羽翼，深相結納，隱然對先生起一種敵對革命的武力，以保障革命前途的發展。而此時目擊着這純粹的革命武力，又漸為當局所劫持，於是先生翻然感悟，知中國的革命事業，應從政治的解放以達到國家的建設，乃決然辭去黃埔軍校職位，而出洋赴德學習政治經濟。先生出國未久，孫先生便逝世，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乃不得不忍痛放棄未成的學業，於十四年冬又回國內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對於整個革命方略多所貢獻，被選為第二屆後補中央委員。這時王伯齡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百事廢弛，精神不振，學校當局乃欲把黃埔學生訓練成材，非復用先生不可，遂強邀先生回校繼王伯齡任教育長。先生再度任教育長後，學校當局每事邀結先生歡心，先生雖知其用意不誠，但冀以革命大義糾正其錯誤，每遇事直陳，不顧忌諱。聽者雖心不為然，但終以欲用先生之才，而極力敷衍。

六 革命的煩悶期

初先生離國後，某巨公已逐漸鞏固其在軍校的勢力，並隨着勢力的增大而逐漸顯露其真面目。十四年秋，蔣慶仲凱先生被刺案，逐去胡漢民，把廣洲政府的政權，逐漸劫持操縱，使變為他私人的勢力。是年冬，先生回國，復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乃希望其翻然覺悟，改變其自私行為，

故悉心經營，訓練學生，王伯齡不自知其拙，因失位而深恨先生，並多方勾結一般屬敗份子，向當局包圍以攻擊先生，當局亦以羽翼已成，嫌先生力陳革命利害，每不以為意。三月十二日之變，是試演獨裁的第一幕，但以師出無名，不得不舞名師共，事變發生後，王伯齡圖中傷先生，挑撥猜忌，將先生調任油頭軍校校長兼第一軍黨代表，而陰使其黨羽羣起反對，以威脅先生。北伐戰起，因事實上需要，強先生_不總政治部主任，以緩革命份子對自己的敵視，先生亦希望從北伐軍的進展中，發展民衆本身的力量，以制裁軍閥的權起，中興革命的力量，遂毅然允諾擔負這最有意義的繁重工作。

七 北伐途中

在北伐開始的時候，先生對部屬說：「我們應該要明白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二重束縛，我們此去是要喚起廣大的農工平民大眾自己起來解除自身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剷除軍閥制度，永絕祖國禍亂的根源，我們更要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爲軍閥的趨向。」只在他這幾句話中，我們就可以明白他意向和苦心了。北伐軍因唐生智的轉變而順遂地進行，就愈和吳佩孚的軍隊相接近，先生在途中，除主持總政治部事務，使部員努力調查沿途的農民生活狀況及土地分配情形外，復兼管行軍參議事項！所以事務至爲忙碌，常徹夜不寐，平旦又復趕程前進，部員多有因精力不支而病的，但先生却精悍如常。先生在征途中，在軍事百忙中，猶不忘他畢生所念念不忘的農民問題，他組織農民生活調查團及農民問題研究會，雖在日忙中沒有具體表

現，但對解決農民間題的努力和系念，在當時的革命軍中實爲僅有之一人，吳佩孚敗後，劉玉春陳嘉模困守武昌城，屢攻不下。先生任攻城司令，親臨城下指揮，槍彈如雨，屹不爲動，後武昌城卒於國慶日克服，先生過漢口洗澡，脅肉盡爛，其任事之艱苦卓絕有如此者！

八 武漢政府的組織

武漢已下，先生被任湖北省政府主任，經營擘劃，鞏固革命的新土。時北洋軍閥開始崩潰，被感適的民衆驟然失去了重壓，民衆運動勃興起來。特別是在武漢，因爲當地的工商業者都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又足以綰轂長江各省，因此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並影響全中國的主要地區；民衆起來的信號到了，這足以動搖軍閥的基礎，並可由民衆的力量，發履革命的事業，先生在這時曾力勸當局拋棄自私的主張，反復說明農民解放，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希望在一席話中，能勸轉當時軍事當局的專橫，短縮革命的過程。無奈其專慾性成，且乘軍事勝利的餘威，不輕視民衆的解放運動，更藉『過火』，『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等輩語，嗾使一般昏庸老朽之徒，露骨地表現反對革命。當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依照決議遷移武漢，能領導革命，乃某公反欲留住南昌，以遂其奸謀。先生認爲這是革命的危機，如果不設法制裁，則革命將收塗地，而且過去的努力，也完全爲所利用，因此非常痛心，曾痛哭一晝夜，由南昌趕回武漢，與大部執監委員成立中央黨部，組織武漢政府，以圖制止陰謀，而挽救革命。武漢的中央黨部和政府先後成立，先生遞補爲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並於這時向中央提議成立土

地問題委員會，將北伐途中所搜集關於土地問題材料，盡量貢獻中央，又令中央農民部和總政治部工作人員合組農民問題研究會，各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隨時隨地組織農民問題研究會，盡量招致農民實際參加討論。使中國革命核心的農民問題，成普遍地令人注意。又由中央農民部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訓練實際工作人員，確定革命的基礎工作；這時實力派人物已經明顯地反對革命，在南京另行成立政府，一面盡力妥協帝國主義，一面向武漢政府攻擊，而武漢政府則對於革命的大計劃則東棋不定，時而主張討伐南京，時而主張北伐，蓋已充分表現出領導機關的無能；十六年夏天大軍出動北伐率領軍閥。先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督率部員隨軍出發，並親自參加督發至所部鐵軍中工作，臨穎決戰，鐵軍傷亡過半，全軍準備犧牲，先生從容不迫，往來於火線中，表示與鐵軍同生死，其勇敢負責，官兵無不感動！

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一切被壓迫的民眾先後的組織起來，城市中的工人及青年學生固能表現其鬥爭的成績，即在鄉村中的農民也已開始搖撼地主的政權；革命羣衆的聲勢，攝服了當時服務於政府中的文武職員，叫他們不敢為非作歹，叫他們不能不日夕勤勞，人人心目中都感覺着舊所謂革命的領袖們——虛偽無恥的所謂民主政治者——如汪精衛陳公博等首先動搖了，並且摭拾反革命派的餘唾，痛罵民眾運動的「過火」，根本反對民眾的要求。於是先生很嚴正的向這般動盪的領袖們警告，以促他們的覺悟。但是，這時候的矛盾並非警告所能解決，而領袖們的覺悟，至多亦不能超過本身利害之一途，先生知革命之頽勢已無可挽回，遂於十六年初冬毅然跳出漩渦，化裝工人，闖道從西北出關。

九 爲民族解放而奮鬥以至犧牲

魯先生離國後，經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曾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中國革命的指導者，在會中先生將中國革命的性質，詳為解釋，並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時蘇聯反對派與幹部派競鬥正烈，牽及中國革命問題，先生只能自守其主張。因此先生遂秘密離開莫斯科，轉赴柏林。

十六年冬抵柏林，專研究政治經濟，博覽叢書，並考察各種實際問題，尤其是對於歐洲各國的農民問題，曾經極留心地考察，並且親自到歐洲各國農村裡面去探訪，調查各當地的農民生活狀況，考察各國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案。他在德國時最久，英、法、匈、奧、波蘭、立陶宛、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諸國家，以及新興的土耳其，殖民地的印度，皆遍留足跡，實際地體驗各國政治，並借此作中國革命的參考，十九年春先生從歐洲回到中國來，回到反動勢力籠罩的中國來，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準備與惡勢力奮鬥，復興中國革命。

魯先生在歷年來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斷，決定「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因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的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原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因此決定中國革命是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革命。在歷史的關係說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未竟事業，打倒一切孫中山先生主義的新徒們，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真

體的說「是要平民羣衆運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權，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根本的推翻封建的軍閥官僚政治，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所以，對中國革命核心問題，在經濟上主張中古時代殘餘的肅清，對小農經濟生產加以改造，同時對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買辦高利貸經濟，應加以清除，而以集體的力量構成「計劃經濟」或「國家經濟」，向着社會主義的路邁進。在政治上主張剷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政治形態澈底消除，而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在社會上主張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役使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為，特別在文化上掃除士大夫階級的「寄生文化」，而代之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勞動文化」，為達到上述的目的；認定一切爭鬥的總和是政治鬥爭，標出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為鬥爭目標。對於農民問題的解決，「則在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寫過渡的辦法」。這是先生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底大略。

先生為求更明瞭實際的社會情況起見，於二十年春間親自到東北及華北一帶調查，考察各種情況，不久即回到上海來，指導各地同志們發動一切的鬥爭。因為先生的主張和行動，一切反動派——地主、軍閥、士紳、買辦、新舊士大夫，帝國主義者等——所嫉忌，尤其是反動的統治者，經先生暴露其罪惡，領導農工平民大眾，直接的動搖其基礎，遂不惜勾結帝國主義者，嗾使龐大，四出羅捕先生，卒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七日被劫捕於上海愚園坊二十號，翌日轉解南京，直至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深夜為所暗害。盡於中國民族解放，農工平民大眾的革命導師，就這樣像太陽一樣的西沉了。先生革命任務雖未完成，而先生革命主義，已為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

爲廢帝那一番話而驚。後來革命黨人對他說：「你開了一條康莊大道，先生革命的精神，亦已爲革命行動戰士們永留下偉大的典範。」**孫福**先生所負的歷史的使命，是終於會完成的。先生遇害時，年僅三十六歲。

據說先生在獄中，其過海之難處，比大牢、重刑尚更甚。——他被囚禁在一個小牢房裏，不能和同牢的犯人交談，也不能和監視他的獄卒接觸。——他每天只能吃一頓飯，而且是粗食。不外豆面或玉米粉，由獄卒送來。一日，他因口渴，向獄卒要水喝，獄卒竟拿去一隻烟嘴。因爲說是煙嘴，所以一吸便知。武平獄卒夏雨朝知道獄卒會吃於獄長，分二支半香烟，自己來抽，他抽出一支，就塞進嘴裏，說：「這就是我吃的水。」獄卒詫異，就問他這水從何處得來。

門禁森嚴。特以兒女別親離散，「照小廈頭」先生親手封閉門戶，始得許出。——他被囚禁在一個小牢房裏，不能和同牢的犯人交談，也不能和監視他的獄卒接觸。——他每天只能吃一頓飯，而且是粗食。不外豆面或玉米粉，由獄卒送來。一日，他因口渴，向獄卒要水喝，獄卒竟拿去一隻烟嘴。因爲說是煙嘴，所以一吸便知。武平獄卒夏雨朝知道獄卒會吃於獄長，分二支半香烟，自己來抽，他抽出一支，就塞進嘴裏，說：「這就是我吃的水。」獄卒詫異，就問他這水從何處得來。

鄧演達先生的生活

鄧先生與家庭

鄧先生與朋友

三 鄧先生一次出國

鄧先生的治學綱要

五 鄧先生歐遊的踪跡及所見

六 鄧先生歸國後的祕密生活

鄧先生與家庭

大概稍微接近一些鄧演達先生家庭的朋友們，誰都知道他的父親鍊人先生是一位曠達豪爽而彌健的長者；他的母親是一位極慈祥親切體諒的女界模範；他的哥哥競生先生是一位純粹的

軍事學者，專在技術上為國家服務從不入政治底蘊。所以鄧先生與其子足出、雖反于之情極篤，然關於政治上的主張和行動，是從來不相聞問的。惟乃翁鏡人先生，則極同情於其抱負，故先生得盡肆力奮志於革命事業。

先生與其夫人鄭立真氏，是舊禮教下的結合，立真女士出自豪家，初未嘗學問，雖伉儷間的生活極樸實，極平淡，却絕少違言。蓋先生深信中國婦女都是在監獄裡頭，受着人所不能的忍受痛苦，應該幫助她們、解救她們。尤其反對一般「時髦男子」，拋棄舊妻子去討「時髦老婆」，故他對於那位早年失學的夫人，自結婚以至二次出國的十餘年間，極力設法使之補習學藝，助其自立。當十五年北伐時，鄭女士已能隨軍擔任救護工作。及先生二次出國後，復繼續入廣州某醫專研習醫理，而先生至是則反決意欲和她離異，這個動機是由這樣出發的：

A、他和她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不能同居。

B、他的工作她不能夠協同。

C、他不能得到一種生活刺激，使他更加進步興奮。

但是這種離異要求，鄭女士當然不願同意的。況且他此時無論在文字上技藝上都已很深造，對於先生每次通信，每多纏綿悱惻的表示，愈使先生非常難受！無奈先生因為工作上的關係，終竟沒有改變他已下的決心，二次回國後，雖曾會晤幾次，却並沒有再賦同居！蓋先生以寄託之重，兒女私情，是早已付諸度外了。